

《资本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审思^{*}

王甄玺 鲁明川

提要:《资本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审思呈现的是“肯定—否定—扬弃”的辩证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西方现代文明的生产力变革、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以及人类历史由“区域史”走向“世界史”的历史进程,客观地指出了西方现代文明进程的历史进步性。《资本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审思并非单向性的进步论而是直指西方现代文明的“病理学”危机:无产阶级的“牺牲”、财富与堕落共生、生命愚钝化以及生态“代谢裂痕”的另类危机。在马克思看来,走出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不仅需要科学地剖析西方现代文明本身,更在于作为革命性的历史方案——社会主义文明实践。

关键词:西方现代文明;资本论;大生产;现代化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25.05.003

现代化与文明紧密相连,如果说文明是社会结构、性质和功能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组织形态的革新,那么现代化就是文明发展的总体实践。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分析几个世纪以来从未终结。国外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西方现代文明优越论,认为欧洲是“世界历史唯一的积极谋划者”,“只有欧洲人才能引领改革和现代化”^①;二是西方现代文明双面论,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具有两面性,既是战争、罪恶的发源地又是各国现代文明的目标^②;三是西方现代文明崩溃论,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的暴力性必然趋向“文明的没落”^③。国内学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分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多,从《资本论》出发剖析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相对较少。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业已展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轨迹、属性以及如何应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历史科学”,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在今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剥开文明的“幻想”,更有利于科学地看待、理解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现代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过程中的历史角色以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理论道路。罗森塔尔指出《资本论》不仅瓦解了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西方现代文明“万古永恒的陈腐观念”,更科学系统地指明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④。因此,挖掘《资本论》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剖析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性还原,更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叙事研究”(23AKS00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本论》的现代西方文明批判及其现代化启示”(2025NDJC151YB)的阶段性成果。

① S. 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0页。

②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页。

③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5页。

④ 罗森塔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冯维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3页。

一、《资本论》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性阐发

文明与现代化并非干瘪枯燥的字眼而是人类社会在实践中构建的历史结晶,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高低的衡量标准就在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生产什么、如何进行生产”。现代化作为文明的样态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向大机器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地区文明向世界性文明的转变,生产力的变革是基础性因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性从生产力的变革、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以及人类史由“区域史”走向“世界史”的角度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考察。

(一)现代化先行者:生产力的现代化

“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在西方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中,现代文明往往被天然地视为资本主义文明,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文明锻造了庞大的物质生产力。异质于斯密指向的“分工和勤俭”和韦伯分析的“知识与宗教”,马克思研究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基本视角就是物质生产力的视角。马克思将文明与生产力相融合,发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对西方文明的变革性重塑。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西方现代化运行的底层逻辑。不断更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机制使得西方文明以爆炸性速度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文明形态和社会秩序,将一切民族都卷入资本增殖的轨道中。

生产力的变革是文明和社会形态变革的“坐标系”。在《资本论》中从生产力视角分析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三点上: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解了自然界的束缚。在传统社会中反复无常的自然灾害、落后的生产工具和受自然限制的劳动时间始终无法创造庞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问世,土地、财富和人口可以迅速集中,“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会立即克服土壤肥力、病虫害等诸多自然条件对社会生产的限制,创造商品产量的奇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更使得欧洲的整个沿海地区无需具有原材料就“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②。二是资本主义分工协作的统一编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篇比较了军队和工厂的运行模式,“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存在本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精细化的分工协作将单个工人的生产变成“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③。在这里,劳动集合的效果是单个人劳动无法企及的,这种统一编排的分工与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更创造了一种新的能量——集体力。三是西方现代文明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撕碎了地方性联结的纽带,更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与地域性限制,^④使商品可以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不同的货币体系之间自由流通。生产规模的持续性扩张使资本从地域性积累扩展至世界性积累,不断消解空间对资本的束缚。西方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区别的标志就在于“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生产^⑤。马克思提出了“资本创造世界市场”意味着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统统从属于或接受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成为世界每个民族不可避免的道路抉择,西方现代文明则凭借生产力变革的绝对优势构筑起了对东方文明和非西方地区的“支配—从属”关系。^⑥

(二)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

保罗·维利里奥用“竞速学”理论来分析西方文明的技术形态并指出人类历史是速度的发展史,历经

①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8、378、1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⑥ 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2页。

“自然速度史”(传统社会)的风力、水力、人力,“相对速度史”(工业革命)的蒸汽、火车交通革命发展和“绝对速度史”(互联网信息时代)。如果站在19世纪欧洲变革的时代就会发现,蒸汽机技术、电磁技术和内燃机技术在工业生产实践的广泛应用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相对速度史”的底色。

现代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就是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与《共产党宣言》对科技简单地描述不同,在《资本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分析中,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加速了科学与技术的融合,科学和技术不再单纯是生产经验的总结或科学家兴趣使然,而是具有了新的属性——科技资本化,科技具有了资本的目的和特征。马克思指出“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合适的技术基础”^①,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曾经的工厂必须靠近水源地,但蒸汽机和相关科技的迅速应用使这一限制得以摆脱。^②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和其他时代相比,“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如何进行生产。^③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生产是“手推磨”,那么在科学与技术融合的西方现代文明中,社会生产则以蒸汽机为起步,新的“资本+科学+技术”模式直接促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拓展。哈维指出《资本论》清晰地勾勒了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科学与技术的强劲融合成为剥削劳动力、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好工具。^④ 在《资本论》1卷第3篇中,马克思认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主要在于延长工作时间,当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加速融合,剩余价值的提取不再是增加工作日的绝对时间而是减少必要劳动的时间。当然,资本通过引入新的机器、新的技术以及新的科学成果并应用于劳动生产,目的并非改善劳动者工作状况而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应对外部的竞争。“机器体系……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⑤,取代了传统的人力和畜力并使科学与技术加速融为一体,马克思对科学与技术的分析并非从哲学角度考量而是将其置于西方现代的生产方式中,即现代科学技术依托资本增殖的逻辑而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延续与扩张注入了“灵力”。

(三)人类史由“区域史”走向“世界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资本的“魔力”:资本创造了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并将人类历史由“自然的崇拜史”转向“资本的崇拜史”。在人类“区域史”中,社会交往仅限于毗邻地区且人类的每一项发明和技术应用都是在某一个地域单独开展。当一切民族强制性纳入世界性竞争、由地区性交往转变为世界性交往时,“世界史”的画卷才逐渐展开。西方现代文明由于迫切需要新的市场、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就必须进行世界性扩张,其运用强制性手段摧毁了非西方地区和落后民族的生产方式并瓦解了“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使不同的区域、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世界性联系。市场成为世界性的市场极大地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大量被掠夺的金银流入流通领域瓦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改变了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分工已不再是区域、民族和国家的分工而是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性质,使人类史由“区域史”走向“世界史”。

西方现代生产方式要求资本进行世界性流通并不断加速消解和突破时间和空间对资本的流通束缚,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⑥,资本所及之处,生产生活空间与精神生活空间均具有了世界性。人类历史由“区域史”转变为“世界史”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使“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代替了“区域性”的个人。可见,人类史和世界市场的呈现并非偶然,而是西方文明的现代生产方式扩张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因为,世界市场的出现以及“区域史”走向“世界史”具有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的客观功能。

①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10页。

② 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53页。

④ 大卫·哈维:《反资本主义世界简史》,陈诺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2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00、89页。

二、《资本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病理学”分析

列宁指出,《资本论》的问世使得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再是“未盗取的普罗米修斯之火”,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正是在《资本论》的“显微镜”下,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现代化的“病理学”理论依据才真正得以暴露。西方现代文明在生产力的迸发中不仅没有开创人类社会翘首盼望的“理想国”,反而引致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生态危机的“资本纪”。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现代文明催生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彰显出了资本塑造文明的变革性作用,但也带来了文明的桎梏和现代性困境。

(一)少数人的现代化:无产阶级的“牺牲”

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②,无产阶级的“牺牲”成为资本增殖的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西方现代化是以无产阶级的牺牲为代价换来少数人发展的真相。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无产阶级的牺牲、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等现实境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这既反映资本主义时代的寄生性、垄断性、控制性的一面,也涉及西方现代化破坏性、损耗性和僵死的一面。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③。在《资本论》中,“牺牲”“耗费”“浪费”等词出现的频次很高,而“牺牲”一词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仅无法解释为何整个社会阶级结构趋向撕裂化,反而有意识地遮蔽凌驾于大多数人生命之上的抽象共同体。

西方现代文明以及现代化在《资本论》中被视为“生产者的殉难史”^④。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带来最现代的物质条件,但绝大多数英国人民处于“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的境地。“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⑤。“牺牲”“不公”贯穿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在西方现代化中,构筑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并非政治经济学宣称的商业民族制度,而是奴隶制度,^⑥并且不断上演“工人……把生命和劳动献给了集体”和资本的故事。^⑦可以说,在西方现代化中,少数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绝大多数人不发展的基础上。

(二)财富的两极分化:财富与堕落共时积累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必然衍生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和成为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二者生产链条和“社会生态位”的悬殊造就了财富占有的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公布了他的调查结论,仅伦敦就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他们贫穷与堕落的“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⑨。

《资本论》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社会两极分化的历史,最大化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轴心。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展示了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并认为无论是整个西方殖民史还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流转、分配的西方现代化运行模式,其本质在于资本的积累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与无产阶级的堕落与贫困。资本增殖与无产阶级堕落成为共时状态,资本不仅表现为“商品的大量堆积”,更表现为产业后备军与剩余人口数量和贫穷的大量堆积。如马克思所言:“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⑩。劳动者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财富但并非完全为自己而劳动,而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和资产阶级的致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与资本家“财富的积累”成正比。因此,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主要聚焦的就是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②④⑤⑥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579、866、758、759、743—744页。

③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2页。

⑦ 马塞尔·莫斯:《礼物》,李立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

“99%与1%”的贫富问题并指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天然属性,^①甚至在最典型、最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美国,其贫困率由2019年的10.5%上升至2020年的11.4%,有3720万人处于生活贫困状态。^②

(三)单向度文明:生命愚钝化

“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③西方现代文明首先开启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使“物的力量”一家独大,“物的力量”以压倒性优势使整个社会结构陷入单向度、不协调、不全面的发展泥潭里。在《资本论》中,“商品”作为“物”的最小细胞时刻左右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单向度的西方现代文明正以物质生产力的标准衡量一切文明,各种形式的利己主义、生产主义、消费主义的话语形态成为西方单向度文明生活的主轴。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产阶级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大的生产力,更在《资本论》中指出了西方单向度的物质文明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在西方单向度的文明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将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领域都置于资本增殖的总体框架内,家庭温情、伦理道德、宗教、法权均转换成冰冷残酷的利益关系。人类作为社会运行的中心被“物”所取代。物的逻辑“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并成为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目的本身,工人的生产劳动不再是成就自身、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活动而成为奴役自身、服务于资本的生产。资本流通的过程悄无声息地从G(作为资本的货币)—W(商品)—G'(价值增殖后的货币)物化为G—G',好像资本无需生产劳动就天然地会自行增殖并成为“物神”。“人与物的颠倒”“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颠倒”形成了西方文明“颠倒”的“景观”。《资本论》展示了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成为同一过程:一是人自身追求的单一化。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的唯一追求,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丰富性,“满脑袋都是生意经”^④。对于一无所有的工人而言,奴役、压迫和倦怠成为烙印于自身的天然属性,如何维持正常的生命所需成为自身唯一的追求。二是社会关系的冷漠化。传统社会中的“家庭温情”“田园时光”“热情、和睦、友爱和互助”等人与人交往的重要维度业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三是社会生产的畸形化。西方单向度文明及其现代化带来的畸形生产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更将人打造为“剩余价值生产机器”,无产阶级被固定在简单操作的流水线中,塑造为“局部的人”并时刻生成愚钝化的生命。^⑤即使是处于资本链条上游的资本家也无法脱离畸形的发展,无限的循环生产使其陷入拜物教中,丧失其生命的丰富意义。

(四)生态的“代谢裂痕”:“另类的危机”

马克思在剖析西方现代文明中发现了一种“另类的危机”——生态的“代谢裂痕”。煤炭、蒸汽与工业化作为西方文明“加速”的标志,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转换为供养资本的“血液”,无休止的挪用、暴力的循环和异化的消费成为资本生产的趋向。如果说西方现代文明生产力的变革在于资本的积累和人力的消耗,那么在生态维度上,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透支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延续的“秘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合并了劳动力与土地这两大形成财富的基本要素并在持续性的扩张趋势中超过了“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⑥,盲目扩张性的生产不断挑战着社会生产结构与生态自我修复的极限,不断加速的生产效率和“热病似的生产”背后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进程中对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虹吸与“透支”,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⑦。在此,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工业生命呈现的是“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的样态并在这种反复的顺序中使生态的“代谢裂痕”不断扩大直至酝酿成

①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② 梁玉春:《贫富差距悬殊戳破美国幻象》,《光明日报》2023年4月16日,第8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0、697、519页。

席卷世界的生态危机。^①如海德格尔所言,西方文明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对自然生态环境提出了野蛮的要求,不断地瓦解自然贮藏的能量。^②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现代化的蔓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世界性扩张。“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西方现代文明趋向的唯一路径,无论是先进的设备抑或科学的管理手段,生产要素的聚拢目的是更好地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然界成为可用的商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的关系从此化为剥削与占有的关系。^③自然界(无论自然资源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均被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求。在自然资源私有化与经济至上的“联姻”中,生态环境的破碎、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无法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已成为现实的重大的问题。

在当代的西欧其生态环境俨然是蓝天白云,既没有工业革命时期无数城镇排放的浓浓黑烟,也看不到开采自然资源而带来的生态污染。但是美丽的表象下并非西方现代文明已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解,而是将高污染和高耗能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且极力要求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私有化”以服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需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废料与垃圾则包装为“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发展中国家。如大卫·佩珀所言,西方的生态文明是寄生于第三世界的生态毁灭实现的,如同一个优雅的超出寻常的饭店的精美外观,只有通过一系列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才能成为可能。^④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引领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以物质为第一准则的“单向度”的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大多数人不仅无法参与现代化,更带来了财富的两极分化、颠倒的物化景观、生态的“代谢裂痕”。马克思精准地发现西方现代文明运行的内核——一切为剩余价值生产服务。当整个社会结构无法“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满足剩余价值生产时,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与历史性并在考察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指向了“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文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法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病理学”危机要远远大于其历史进步性。

三、《资本论》内蕴的现代文明路向:走出西方现代文明危机

工业革命至今,西方现代文明构筑的经济模式、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本论》传播的“远征”中,十月革命在俄国的爆发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内在的一切资本主义要素不再是“单轨制”,社会主义作为异质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发展模式,为西方现代文明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性方案。“《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⑤《资本论》内蕴的文明路向不因文本时间的流变和语境的转换而暗淡,相反,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文明在现代社会实践的绽放而迎来了用《资本论》剖析文明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视角。

事实上,西方现代文明及其附着的“病理学”危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只是在程度、范围和意识形态外观层面发生了改变。《资本论》内蕴的现代文明路向在于使人们识别西方现代文明的“病理学”危机并在把握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契机中选择一条新路,这个发展方向的契机就是全球化时代下西方现代文明方案的整体性失败。如何把握住这些历史性契机?《资本论》并没有给出直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22页。

②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

④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现实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持续性批判以及十月革命至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能够为走出西方现代文明危机提供有效的出路和方向,分别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望:

(一)重建个人所有制

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现代化呈现出人类社会与生态界的“双重透支”并非道德哲学叙述的“人心不古”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当私人资本拥有任意支配劳动力和生态资源的权力时,狭隘的私人利益和欲望将不断突破劳动力与生态环境的客观限度。《资本论》展示的“少数人的现代化”“财富两极分化”“生命愚钝化”“生态裂痕”等危机不仅在西方现代文明不是社会问题,反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现实基础。因为大量的“过剩的人口”“产业雇佣军”“愚钝化的劳动力”和“生态断裂性浪费”是资本主义繁衍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的“祭祀”与“牺牲”则成为西方现代文明演化的一般路径。

要走出异质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就必须重建个人所有制,使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回归于公有的社会结构中。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对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这并不是说个人将占有社会化的机器与生产资料,而是以“共同劳动”为基础、共同占有土地和劳动生产资料的相互关系,如此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参与和享受现代化进程和成果,激发劳动者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文明的路向并非指向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现代化自我演化与自我否定的路径,而是在真正的联合与自由的生产方式中最大程度地消灭剥削,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引发的世界性危机,最终构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二)公共性的社会生产

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社会生产方式始终围绕资本逻辑来展开,“破坏性生产”与多重的社会性危机使西方现代文明无法成为真正的人类社会文明。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了“资本的文明面”,即西方现代文明“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其生产力的变革和更先进的社会要素更能够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创造条件。^②《资本论》三卷本,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到“资本的流通过程”再到“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不仅揭示了资本如何增殖的逻辑,又蕴含了更高级社会文明的革命性逻辑。这一革命性逻辑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创造新的社会文明。^③“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恰恰在于从西方现代文明“病理学”症候危机走向社会主义文明。

具体来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对商品的“神秘性质”进行了“谱系学”的分析,更将社会生产指向了“公共性的社会生产”,即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来消解资本主义“破坏性”生产。在此,现代化的生产能力将服务于全体人类的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在《资本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审思中,马克思始终指向的是扬弃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④唯有在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中,“公共性的社会生产”将取代私人占有性的社会生产,劳动成为真正的自由劳动。劳动者由“祭祀”与“牺牲”的状态转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公共性的社会生产”意味着社会化生产具有可调节性,消解“个人受抽象统治”状态的生产机制,生产逻辑是为了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创造出共生、共创、共享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业已充分证明了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现代化演进下社会化大生产已不再起主导性作用,剔除资本逻辑不仅不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会更有利于减少劳动者的“透支”和生态资源的“浪费”并避免资本的“破坏性生产”。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西方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态度与方式具有掠夺性。在17世纪西方的诗歌中,自然资源和动植物只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

③ 冈本博之等主编:《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刘焱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④ 刘同舫:《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意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被人食用和利用才可以获得圆满。^①在哲学领域中,笛卡尔将人类视为“自然的占有者与统治者”,培根认为“取得最无邪和最有价值的胜利,那就是征服自然”^②,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与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如同血液流淌于西方现代文明之中,这种文化论调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中也表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生产中并演化为攫取非西方国家生态资源以改善本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西方生态至上”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从工业角度来论证西方现代文明的反生态性,也剖析了西方现代农业的弊病,西方现代农业的进步“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全球性联合与非利益性取向的生态行动始终难以形成(西方现代文明“大本营”美国拒绝签订各类生态协定)。原因无他,资本主义生产始终无法避免对生态资源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文明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要实现这一点不仅要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西方现代文明自然观,更需要将自然的开发与利用纳入社会共同管理之中,在最适合于人类社会和生态界持续性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④

中国自古以来追求“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不仅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表达,更在新时代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生态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如何走出主客二元对立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斗干出来”^⑤。

〔作者王甄玺,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鲁明川,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310015〕

责任编辑:张东锋

① 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宋丽丽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② 转引自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79—58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9页。

⑤ 习近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人民日报》2024年11月20日,第2版。